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八六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集

1986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6 年

一个大写的“北京人”	(2)
论婚姻与家庭	(5)
致郭风 (2 月 1 日)	(8)
致宫玺 (2 月 2 日)	(9)
致臧克家 (2 月 3 日)	(10)
致小读者	(11)
漫谈过年	(13)
致茹志鹃 (2 月 26 日)	(17)
致巴金 (3 月 3 日)	(18)
悼丁玲	(19)
致茹志鹃 (3 月 10 日)	(22)
给《内蒙古工人》的题词	(23)
致茹志鹃 (3 月 20 日)	(24)
致陈祖芬 (3 月 20 日)	(25)
六一儿童节寄民进会友	(26)

两栖动物	(29)
《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序	(33)
教师节给《班主任》的贺词	(34)
致李玲修 (4月19日)	(35)
关于男人 (之五)	
六 我的老伴——吴文藻 (之一)	(36)
七 我的老伴——吴文藻 (之二)	(46)
我和商务印书馆	(65)
话说“秀才不出门”——我的一天	(68)
寄小读者的信	(71)
给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贺词	(74)
漫谈赏花和玩猫	(75)
致陈祖芬 (5月31日)	(79)
致臧克家 (6月9日)	(80)
致吴海发 (6月18日)	(81)
我的祝贺	(82)
好好地写，前途无量	
——为《中学生散文选评》序	(83)
给夏令营盲童朋友们的一封信	(85)
当教师的快乐	(87)
致巴金 (7月13日)	(90)
我很喜欢陈祖德这一家子	
——喜读《超越自我》	(91)

教师节唤起的欢乐回忆	(96)
致宫玺 (7 月 26 日)	(99)
致刘麟 (8 月 5 日)	(100)
致巴金 (8 月 7 日)	(101)
忆天翼	(102)
说梦	(106)
致巴金 (9 月 4 日)	(109)
为《崛起》题词	(110)
致周达宝 (9 月 9 日)	(111)
我和北京	(112)
致巴金 (9 月 26 日)	(117)
《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118)
致宫玺 (10 月 8 日)	(120)
愿从今年开始年年都是国际和平年!	(121)
致宫玺 (10 月 24 日)	(123)
致巴金 (10 月 31 日)	(125)
致巴金 (10 月 31 日)	(126)
致陈祖芬 (11 月 9 日)	(127)
“茶叶故乡”的故乡	(128)
民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30)
致巴金 (11 月 17 日)	(131)
致宫玺 (11 月 17 日)	(132)

谈巴金的《随想录》	(133)
致陈祖芬 (12月2日)	(138)
致宫玺 (12月3日)	(139)
致巴金 (12月9日)	(140)
一代的崇高女性	
——纪念吴贻芳先生	(141)
《旅游英语会话》序	(144)
致《小号手报》的记者们 (12月14日) ...	
.....	(145)
为《青少年日记》题词	(146)
给小朋友的信	(147)
致葛翠琳 (12月16日)	(149)
我这一辈子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	(150)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154)
致赵清阁 (12月22日)	(157)
介绍三篇好小说	(158)

1986 年

一个大写的“北京人”

在上月的《北京日报》上，我连续两天看完了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原载《人民文学》1985年12期）。后来又看到了《人民文学》刊物，我立刻给心武写了一封信，我说：“读了你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十分感动。你是一个大写的‘北京人’！作为一个老北京的老百姓，我更感谢你……我有好几年没有出面了，唯一的度日方法就是看书看报，但是从我眼下掠过的文艺刊物中，很少找到像你那样一个心眼倾注关心‘人民’的作品……”

现在，我手边有一本《瞭望周刊海外版》，看了‘作家十人谈’一栏，我十分欣赏蒋子龙——他是很佩服的一位作家——的那篇《莫要输掉自己的挑战》（读者应当全读这篇谈话，在这里我只能选引几句）。他说：“……当今的中国文坛……多少有点理论代替创作，宣言多于作品的倾向……有人喜欢刮一

阵风……怎样怎样写才是文学的正宗，才能永恒，等等……”他又说：“文学要脱离当代，当代就不需要你这样文学；文学不关心人民，人民也必将冷淡文学。”他最后的一句话，帮助我找出为什么我看过许多文艺作品，而都觉得很冷淡，而留不下任何印象的原因。

“作家十人谈”中，还有刘心武的一篇《创作的快乐》。他说：“一九八五年对我来说是问心无愧的一年……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创作自由’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对于我来说，空洞的讨论是没有吸引力的。停顿下自己的创作去侈谈自由更是不可思议。我一如既往，自由地去……”他提了一大串的“自由”以后说“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我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我的艺术个性。我因此而快乐。”

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永远不会讲理论，也不爱看谈理论的文章。我只爱看能写出好故事的作品，而这故事确实是来源于当时当地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的生活的。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在第一个问题上，就引用了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刘心武就是一个不大讲理论，也不写宣言，而只关心他周围的当地当时的人民所关心的事的作家。

他欢畅自由地在人海中游泳。他接触到了成千上万的公共汽车司售人员，体会到了他们的哀乐悲欢；以及千千万万的乘客，和他们千千万万种的哀乐悲欢。在这“人太多，人挤人”的北京城里，人人心里都有一股蕴藏着随时可以爆发的一种怨气。

但是这千万股怨气，都在一位老先生的一双眼睛，一种眼神下，散开了；消失了。这种眼神是什么？是“人挤人”的“血肉长城”之间的一种润滑剂，就是谅解和宽容，就是同情和爱！

刘心武还很年轻，创作的道路还长得很。我祝愿他就这样欢畅自由地写下去。

我知道他的自由是有边际的。那就是人民的悲欢哀乐的海洋的边际。他将在这海洋中自由地游泳、自由地构思，并写出人民从心底爱看的、能充分呈露出人民自己的悲欢哀乐的作品来。

1986年1月13日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年第2期。）

论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个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才”和“貌”，而应该是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的细胞的责任，因为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1986 年 1 月 17 日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婚姻与家庭》1986 年第 5 期。)

致 郭 风

郭风同志：

十二月卅日示悉，我的字怎能参加“书画展”？！想了半天，只好写点自己的东西来塞责。我记得周明同志，曾让我为您写“闻鸡起舞”四字，兹附上，收到请复。

祝
春节快乐

冰 心

二月一日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无声的雨》拜读，不是套话，您的诗很清澈，古人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这种意味！看了后记，才知道您是空军复员的。我的父亲也有时写旧诗，友人称他为“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您也许还不是“将”，不也是“裘带歌壶”了？祝春节好！

冰 心

二、二日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贺信甚谢。岁云暮矣，我马齿加长，说来已是 86 岁！您是八十年代八十岁人，正是大有作为之秋，敬祝
笔健！

冰 心

一九八六、二、三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小 读 者

亲爱的北京小读者：

这封信的对象，是北京的小读者，地点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太平盛世的春节，也就是农历丙寅年的春节。寅年是虎年，我欣祝小朋友们在这一年中，像小老虎般有一股羁绊不住的斑斓奔跃的朝气！

小朋友，你们现在生活的地区和时代，所得到的春节快乐，比从前的和全国其它地区的小朋友所得到的，都要圆满丰富得多。

我知道春节期间，你们会得到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叔叔阿姨给的小人书、玩具和糖果。我希望你们在得到这些礼物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周围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不自私”地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

你们得到的压岁钱，最好交给父母，请他们替你储蓄起来；或是订阅几份儿童刊物，来丰富你们的知

识。

如果你们得到花炮，要注意在放过之后，把地上的纸屑药灰扫起来放在垃圾箱里，不要在夜晚九时以后放花炮，以免惊扰老人和婴儿的安眠。

总之，我愿你们在快乐的游戏里，要记住保护“环境美”的重要性，如不随地乱扔糖纸果皮之类，这些我早已对你们谈过，就不必再提醒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你们有一个最欢畅健康的春节！

热爱你们的朋友

冰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6年2月8日。）

漫 谈 过 年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拿在手里捻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 and 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铜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那时已是中华民国时代了）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

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的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面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亲友到我家街上来观灯的，我们都高兴地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

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工人日报》1986年2月9日。）

致 茹 志 鹃

志鹃同志：

昨天我的大女儿吴冰给我看了一期《文摘报》（1986 年 2 月 23 日），光明日报社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内登一段消息说：“……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周介人谈到对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些反映……老作家冰心看过作品之后，为作家难过得哭了。”我十分惊奇，他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和张贤亮素不相识！就这篇作品，虽也“不甚欣赏，不够满意”，但何至于为作者哭了？！请你代问一下，顺祝安好、盼复。

冰 心 匆 上

二、廿六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得你一封长信，像你那样写字艰难的人，居然写了那么多，真是感谢！你说你尽说自己，我最惦记的也是你自己，我喜欢听。

我还好，写字不如你那么困难，但是杂事也多，尤其是常有人来访问，我很厌烦。不过昨天夏衍来了，谈了半天，都谈到你（来的还有李子云，她说你写字困难），什么时候我们都带个女儿再聚一次呢？问小林好，她托吴泰昌带来的香蕉，我吃了很好，近来我只吃香蕉。祝你多休息！

大 姐

三、三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悼 丁 玲

3 月 4 日的下午，我又打电话到丁玲家里，探问她的病情。接电话的是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她告诉我“丁玲已于今晨十时多逝世了”，我放下听筒怔了半天，又一位朋友和我永别了！

我和丁玲相识以后的画面，一幅一幅地从我眼前掠过：

1928 年的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

1931 年她编《北斗》杂志，我曾为她写稿，那时我们通信，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她的本名是蒋冰之。

1931 年或 32 年，她到北京燕京大学我的家里来看我，正值我为儿子吴平洗澡，她慨叹地说：她就不常有这种的和孩子同在的机会。

1936 年的夏末，我和文藻再次赴美，路过南京，听说丁玲住在南京郊外，我们就去看望了她。当天夜

晚她就来回看我们，在玄武湖上划船谈话。

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议上，我正好和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1951年后我从日本回来，那时她正致力于新中国文艺领导工作。我记得我参加全国作协，还是她和老舍介绍的。

1955年以后，忽然又说她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在批判大会上我只看见她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上，低头记着笔记，从此又是二十多年！

直到1979年她回来了，住在木樨地，作协开会时，接我的车也去接她，我们在车上谈了不少的话。

1980年秋季以后，我摔坏了腿，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她来看我了。

1984年2月，她来看我，带来了她的“近作集”。

1985年6月，她又带来《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也说起她有肾病，不过她还是那样地健谈，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写追悼文字，我的手都软了！这些年来，振铎、老舍、郭老、茅公、林巧稚大夫、吴贻芳校长……最近又是我的老伴，我的二弟，现在又加上丁玲！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难过的是他们生前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只能从他们遗留下的不朽的事业中得到慰藉，在我們有生之年也将为承继他们的为人民的工作而不断奋斗！

1986 年 3 月 7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6 年 3 月 15 日。）

致 茹 志 鹃

志鹃同志：

信拜读，你那样忙我还吵你，十分不安。我想“解铃还是系铃人”，请周介人同志去更正一下也好。

党委书记责任重，烦忙可以想见，不过这的确是体验生活的好岗位，你了解党外的许多朋友，交流起来方便一些。

奉上相片一张，不知你看见的是否这一幅？

北京今年暖得很，难得前几天下了一场雪，我的孩子们都急忙忙地到各风景区去拍雪景。我行动不便，哪儿也没去，否则早就飞到上海去了！听说上海很冷，春寒望珍重！请代问安忆好。

冰 心

三、十、一九八六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给《内蒙古工人》的题词

祝愿

《内蒙古工人》在内蒙古成立四十周年，和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多发表一些文字，引导内蒙古草原少年儿童发扬：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在人生大道上欢欣勇敢地迈进！

冰 心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一日

（最初发表于《内蒙古工人》1987 年第 6 期）

致 茹 志 鹃

志鹃同志：

感谢周介人同志写的声明，我错怪他了，但希望此事能得到澄清。

我对您很不满意，您信的下款，写什么“您的学生”，这也太见外了！一点不真实也不亲切，下次千万不要这样。

不知安忆要您向我学什么？我近年来越想越对自己不满。我这人天地太小，也从不自动或积极地做什么事，只能这样过退居息影的生活。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您不做谁来做？“能者多劳”还是担负起“烦人”的事吧！匆匆。祝笔健，问安忆好！

冰 心

三、廿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陈 祖 芬

祖芬同志：

你怎么有心脏病呢？得你信十分惦记，是否去阜外医院看一看？我那边有熟人，那里专看心脏病，你千万不要来看我，太远了，打电话就行。

我并没有去福建，一时也不想动，走起来太麻烦了。你那篇文章《经济和人》不是登在《当代》吗？那序自然也在那边了。请他们不要给我稿费，给我订一年的《当代》吧。匆匆祝健康！

冰 心

三、廿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六一儿童节寄民进会友

亲爱的民进会友们：

我相信我的会友们大多数都是文教工作者，是老师同时也是父母。在六一儿童节，我感到和你们有说不完的话。

“儿童是世界和人类的未来。”这句听惯说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于儿童，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我们要如何和他们相处呢？

我们当然会热爱他们，无论是我们的学生或子女，但同时还要尊重他们。不是用居高临下的、管教或训示的态度，而是用平起平坐的商量的方式和他们谈话。不是用“溺爱”来放任他们，而是用“热爱”来信任他们。对他们的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老师和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传达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父母和老师不随地吐痰，孩子就不会随地吐痰；父母和老师不骂人，孩子也不懂得骂人。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许多年以前，有一位老太太对我抱怨她

的孙子，说：“大卫又骂人了，他妈的。”我不觉笑了起来，她自己先骂人了，怎能怪她的孙子呢？

小的时候读修身课，讲“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我想孔子可能在家里没有“怒”过。但读《论语·宪问》，上面写着孔子用杖叩原壤的腿，他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怒得够厉害的了！因为原壤是一个“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的人。至于“曾子家儿不知骂”，我想是完全可能的。

话说回来吧。我常常得到小朋友的来信，一般是报告自己的学习和活动的情况，有的就请教如何写好作文，说是长大了想做一个作家。近来呢，他们的问题更多了，问什么是理想，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共产主义。最后这个问题，我更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了。可见八十年代的儿童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思想是多么奔放！我现在总感觉到自己不能和时代同步前进了。无论是看书报，听广播，看电视，有许多事物我都看不大懂，听不大懂，尤其是关于哲学和科技方面的。我觉得当今之世，做一个长辈和老师，都很不容易！我想我的会友们一定都在随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也充分地准备好回答孩子们的问题。请把你们宝贵的经验告诉我，好吗？

祝你们和儿童一起度过欢乐的儿童节！

你们的会友

冰 心

1986 年 3 月 2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进妇女》1986 年第 2 期。)

两栖动物

一九一一年冬，我们从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大家庭里。以一个从小在山边海隅度过寂寞荒凉日子的孩子，突然进到一个笑语喧哗、目迷五色的青少年群里，大有“忘其所以”的飘飘然的感觉。

我的父亲有一个姐姐，四个弟兄。这五个小家庭，逢年过节便都有独自的或共同的种种亲戚，应酬来往；尤其在元旦到元宵这半个月之间，更是非常热闹。我记得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早上，在我家大厅堂上给祖父拜年的，除了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之外，在大厅廊上还站着一大群等着给祖父鞠躬的各个小家庭的，我要称他们为表兄表姐的青少年们。这一天从祖父手里散发出来的压岁钱的红纸包，便不知有多少！

表姐们来了，都住在伯叔父母的居住区——东院。她们在一起谈着做活绣花，擦什么脂粉，怎样梳三股或五股辫子；怎样在扎红头绳时，扎上一圈再挑起几绺头发来再扎上一圈，这样就会在长长的一段

红头绳上，呈现出“寿”字或“喜”字等花样等等；有时也在西院后花园里帮助祖父修整浇灌些花草。

表兄们呢，是每天从自己家里，到我们西院客厅一带来聚集。他们在那里吹弹歌唱，下棋做“诗”。我那年才十二岁，虽然换上女装，还是一股野孩子的脾气，祖父和父母都不大管我。我就像两栖动物一样，穿行于这两群表兄姐之间。他们都比我大七八岁，都不拿我当回事，都不拒绝我，什么事也不避我。我还特喜欢往表兄们的群里跑，因为那边比较热闹，表兄们也比较欢迎我，因为我可以替他们传书递简。现在回忆起来，他们也是在“起哄”，并不严肃。某一个表兄每一张纸条或一封信给某个表姐时，写好多半在弟兄中公开地笑着传看。我当然也都看过，这些信的文字不一定都通顺，诗也多半是歪诗，不但平仄不对，连韵也没有押对。我前一年在烟台时，受过王峰逢表舅的教导，不但会对三个字、五个字、七个字的对子，并且已经写过几首七绝了，我的鉴赏力还是不低的！

这些纸条或诗，到了表姐们手里，并没有传看，大都是自己看完一笑，撕了或是烧了，并嘱咐我不必向大人报告。我倒是背下了一封比较通顺的信，还不完全：

×妹妆次，自违雅教，不胜怀念，咫尺天涯，未得畅谈，梦寐萦思，曷胜惆怅，造府屡遭白眼，不知有何开罪，唯鄙人愚蠢，疑云难破……

还有一位表兄写的一首七律诗，我觉得真是不错的：

此生幽愿可能酬，
未敢将情诉蹇修，
半晌沉吟曾露齿，
一年消受几回眸，
迷茫意绪心相印，
细腻风月梦借游，
妄想自知端罪过，
泥犁甘坠未甘休。

这首我认为很好的诗，也不曾得到那位表姐的青睐！后来在我十七八岁时，在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书桌上，看到清代专写香奁诗的王次回的《疑雨集》中，就有这首诗。原来就以为很有诗才的那位表兄，也是一个“文抄公”！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男女还没有同学，社交也没有公开。青年人对异性情感的表示，只能在有机会接

触的中表之间，怪不得像《红楼梦》那种的爱情故事，都是“兄妹为之”。

1986 年 3 月 28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6 年第 6 期。）

《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序

福建出版总社鲁岩同志来要我为即将出版的《当代作家书画集》作序。他说：一来是为福建出版总社收集当代作家的资料，同时也印行他们所作的书画，以应海内外读者的要求。

我知道当代有许多作家在写作之外，还能书善画，也有许多读者不但爱读作家的作品，对于作家们的手迹，也感到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们的书画。这本集子的印行，一定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

1986 年 3 月 29 日

《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2 月出版。）

教师节给《班主任》的贺词

曾经过了十年教师生活的我，在读看《班主任》的时候，感到十分的亲切。在论坛、工作笔谈、问题讨论和消息与借鉴等栏目里，不但读到许多诚挚精辟的文章，还找到几位我所熟悉而敬重的名字。如主编韩作黎，供稿的陈鹤琴老前辈，以及年轻的刘厚明和韩少华。

我衷心祝愿为培养更多的优秀的教学育人的班主任，《班主任》杂志要永远这样朝气蓬勃地刊行下去！

冰 心

1986 年 4 月 7 日

（本篇刊于《班主任》1986 年第 4 期）

致 李 玲 修

玲修同志：

信收到，相片三张也拜领，感谢之至！（上面的两位男女朋友，也忘记是谁了。）上次周达宝来，把君子兰送来了，由我女婿陈恕在管，他也忙，又不是会养花的人，当尽量学习养好。请打电话来。我还好，您怎样？匆匆。

冰 心

四、十九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关 于 男 人（之五）

六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是别人不一定会做、而且是做不完全的。

这篇文章，我开过无数次的头，每次都是情感汹涌，思绪万千，不知从哪里说起！最后我决定要稳静地简单地来述说我们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共同度过的、和当时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的“平凡”生活。

今年一月十七大雾之晨，我为《婚姻与家庭》杂志写了一篇稿子，题目就是《论婚姻与家庭》。我说：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有了健全的细胞，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健全的国家。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人组成。

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

夫妻关系是婚姻关系，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这“志”和“道”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等），然后是“情投意合”（这“情”和“意”包括生活习惯和爱好等等）。

在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

一个家庭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起一个健康细胞的责任，因为在它周围还有千千万万个细胞。

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之中。

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是中国人民几千年

智慧的结晶。

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

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

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线”，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

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这一切！

我接受写《论婚姻与家庭》这个任务，正是在我沉浸于怀念文藻的情绪之中的时候。我似乎没有经过构思，握起笔来就自然流畅地写了下去。意尽停笔，从头一看，似乎写出了我们自己一生共同的理想、愿望和努力的实践，写出了我现在的这篇文章的骨架！

以下我力求简练，只记下我们生活中一些有意义和有趣的值得写下的一些平凡琐事吧。

话还得从我们的萍水相逢说起。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一次船上的中国学生把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其中光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就有一百多名，因此在横渡太平洋两星期的光阴，和在国内上大学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就是没有课堂生活，而且多认识了一些朋友。

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撙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那时我们几个燕大的同学正在玩丢沙袋的游戏，也就请他加入。以后就倚在船栏上看海闲谈。我问他到美国想学什么？他说想学社会学。他也问我，我说我自然想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他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逆

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这次船上的清华同学中，还有梁实秋、顾一樵等对文艺有兴趣的人，他们办了一张《海啸》的墙报。我也在上面写过稿，也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这些事文藻都没有参加，他对文艺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和我谈话时也从不提到我的作品。

船上的两星期，流水般过去了。临下船时，大家纷纷写下住址，约着通信。他不知道我到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入学后，得到许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函，我都只用威校的风景明信片写了几句应酬的话回复了，只对他，我是写了一封信。

他是一个酷爱读书和买书的人，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自己看过就寄给我。我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奇，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这些事我当然没有告诉文藻。

我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旧病——肺气支扩大——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那时威校的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我。文藻在新英格兰东北的新罕布什州的达特默思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三年级——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新罕布什州离波士顿很远，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我记得一九二三年冬，他因到纽约度年假，路经波士顿，曾和几位在波士顿的清华同学来慰问过我。一九二四年秋我病愈复学。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我曾随信给他寄了一张入场券。他本来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了，还向我道歉。但在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我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们信函往来，

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

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樟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秋后的教学，我惦记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〇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

“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着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

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搭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

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

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 丁
羽 毛 纱
样 样 都 差
傻 姑 爷 到 家
说 起 真 是 笑 话
教 育 原 来 在 清 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

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

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〇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

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

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过印

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

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

《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〇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报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给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

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

光看着我：“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

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厂劳动，一九七〇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

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

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〇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

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了），这小型的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我在《衷心的感谢》一文中（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写过了。

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红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讲得就非常地客观而公允！

第四阶段，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前十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

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只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不提工农群众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人为地制造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而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反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从心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伟大、英明、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惜的是文藻没能赶上披读这篇文章了！

写到这里，我应当搁笔了。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足。要说他八十五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

1986 年 11 月 2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作家》1986 年第 4 期、1987 年第 2 期。）

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

到了八九岁，我会看课外读物了，不但爱看《三国》、《水浒》、《西游记》，还喜欢看新小说。那时我的塾师是林伯陶先生，他让我造句，句造得“好”时，他就批上“赏小洋两角”。我攒够了赏金，就请海军学校每天到烟台市取信的马夫，到市上的明善书局去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大多数是林琴

南先生译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这些书中的动人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得下来！无疑这些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的奖赏愈多，我买的书也愈多。

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轻的编辑，如茅盾、郑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1923 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1923 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我自己现在也八十六岁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中，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忘的良师益友！

1986 年 5 月 2 日

（本篇最初刊载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1 月初版。）

话说“秀才不出门”

——我的一天

自从做了不出门的秀才以来，“能知天下事”的途径，除了阅读报刊杂志以外，就是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了。应该说这些途径都给予我以很大的快乐和享受。我每天醒得很早，大约早晨四、五点钟就完全清醒了，这时我想得最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事，我都想到了。

我的床边小桌上，放着一架小钟，枕边放着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我记得是一九八〇年春我最后一次访日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的。冬天亮得晚，我用手电照看，一到早晨六点，我就开始收听“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地”节目，这些节目使我得到许多新的学问和知识。以后再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才起来梳洗。用过早餐，写了头一天的日记，七点半我又躺下休息，准备上午应做的事，如写信，见客或写小东西，休息时当然不会睡着，

而这时间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正是我最喜欢听的“人民子弟兵”节目，它不但报道了全国各地各兵种战士们的动人的故事，还有历代名将的丰功伟绩。此后就是每天午后十二点半我再次休息时，收听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有许多小说如《蹉跎岁月》、《倾斜的阁楼》、《新星》等，我都是通过十分清脆而传神的播音员口里听来的，似乎比自己看书时还带劲！再就是夜晚入睡前三点四十五分的“体育新闻”了。我看电视，也最爱看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任何一种球赛，我一场不“拉”！我在晚上从不写字或看书，除了看电视，也不作任何消遣。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当然要看了，音乐会和赛歌会我也爱看，遗憾的是电视节目预告的时间不如广播时间那么准确，广告和临时加入的短片也不少，好的故事片若是迟延了下去，就会把我“每夜十点前一定上床”的时间打乱了。

总起来说。我们国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教育性很强，一般故事也很清洁健康。记得一九八〇年病前，我常参加访问团出国，在国外旅馆住着，夜里若不开会，我就喜欢独自关在屋里看电视。国外的电视台很多，放映的时间也很长——大都从早晨六点到夜里两点。放映的故事节目色情和凶杀的居多，中间还往往穿插许许多多的广告。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

在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时，都觉得耳目一清！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6年6月17日。）

寄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北京日报，它让我占用报纸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公开的回信。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得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小朋友们的信。在这些笔迹端整、文字流畅的信里，你们都殷勤地问起我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的情况，随后就告诉我你们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解答。有的信里还附带有你们自己写的诗、文和画的图画；或是一条红领巾，甚至有小石子和花瓣。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到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被爱被关怀的人是幸福的，但我还记得有一句古语说：“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的确，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他自己必然也会感到“付与”的快乐和满足。你们问我的问题中，就有一条是“什么是幸福？”我怕我自己回答得不全面或不准确，我查了《辞海》，上面就是说幸福是“心

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你们给我快乐时，你们自己不也感到心情舒畅吗？

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想？”《辞海》上说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说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我觉得只要你们不断地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一面要勤奋地多写——每逢有使你感动的事情，你就抓住这激动的真挚的感情把它写了下来。一面还要广泛地多读——多读一些古往今来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取得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写作时千万不要抄袭模仿，矫揉造作，也不要堆砌词藻、无病而呻。只要你感情真挚，而且词能达意，写得多了，眼睛雪亮的广大读者，就会承认你是个有希望的小作家。

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正是你们在过着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祝贺你们节日快乐。你们这一代儿童，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从长辈们的手里接过来的节日礼物，一定很多。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条真理，除了以自己“三好”的成绩来报答上一代人对你们的爱护与关怀之外，还把你们得到的礼物，尽量尽情地和同代人一同享受，我想在这一天你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地快乐！

和你们同乐的朋友 冰 心

1986 年 5 月 2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86 年 5 月 31 日。)

给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贺词

文化部和中國作協主辦的兒童文學創作會議，將於今年五月在山東煙台召開。我因病不能參加，失卻了向同志們學習和舊地重遊的機會，我感到十分遺憾！但是這個會議的召開和開會地點的決定，都使我十分歡喜而激動。我深信，我們的兒童文學工作者在我的第二故鄉——煙台的天風海濤推送之中，交流和討論一定會加倍地活潑熱烈，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也一定會在已有的成績上，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

冰 心 敬 賀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漫谈赏花和玩猫

我为什么不说栽花和养猫？因为我从来没有伺弄过花卉和小动物，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爱做的事，他们把我“惯”成一个“坐享其成”的剥削者！

先谈赏花。

我的祖父爱花，一九一一年我见到他时，他伺弄的都是名贵的花。他中年时期，在福州道南祠设帐教学时，就写过十首种花育人的诗，至今他亲笔写的这十首诗，还挂在我的卧室兼书房的墙上。我看见过他伺弄兰花和莲花。在我们福州老家小小的后花园里，小径的两旁：一边是十几盆青淡的兰花，一边是十几盆红艳的莲花。摆着兰花盆的长凳腿下，还放着四个盛满清水的碟子，阻止蚂蚁顺着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祖父剪兰花的剪刀，也是竹子做的，为的是不伤花茎。他养出来的那些莲花，还都是并蒂的，还有三蒂、四蒂的，我在别家的花园里，还没有看到过！

我父亲栽花时，还是在工作最忙的时代，一九一一年以前。烟台也不比福州，天气干冷，因此他种的都是些一般的花，如菊花、江西腊、美人蕉之类，还有桃、李、杏、苹果等果树，只要满院子五彩缤纷，他就很满意。到了北京，他虽也每日上班，但工作上闲散多了，而他种的花也还是这些，甚至有秋海棠，野茉莉之类更为平常的花。

说到养小动物，父亲癖爱犬、马。在烟台时期，常常带我骑马。到了北京，不能养马了，但我们家里还不断地有狗，哈巴狗、北京长毛狗都有。我的大弟弟还存有一个小本子，专记我们那十几年养过的狗，名字、毛色、专长等等。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名叫“哈奇”的金黄色的哈巴狗，最机灵了，会逮耗子。它是我弟弟们的好朋友。我的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会凫水跟在船后。弟弟们玩够了，骑车回家，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一位站在门口看街的老太太，向我弟弟们叫：“学生，别让您的狗跑了，看它跑的这一身汗！”

现在，我的儿女们和他们的配偶，也都喜欢养花。他们什么花草都爱：自己买的，人家送的，甚至人家扔的，他们也捡起来养。什么珠兰、石竹、朱顶红、凤尾草、仙人掌……窗台上、凉台上都摆满了。朋友送我的花，如果是切花，我就插在总理像前和自

己案头的瓶子里；是盆栽的我就交给女儿们，特别是名贵的花，如君子兰，我接过后，就像拿到一块滚烫的烤白薯似的，立刻就给他们。从此，如何浇水施肥，我就都不闻不问，免得珍惜这花的主人万一问起，我可以不负花卉荣枯的责任。但如果这君子兰开了花，我知道他们会捧来放在我的窗台上的！

谈到养小动物。我父亲家里从来没养过猫。说起来，狗的确比猫灵得多，而且对主人也亲得多。谚语说“狗投穷，猫投富”。猫会上房，东窜西窜地，哪家有更好的吃食，它就往哪家跑。狗却是恋人过于恋吃。记得四十年代初，我们在重庆郊外歌乐山家里养过一条小狗，是我的小女儿从山路上捡回来的。抗战胜利了，我们北归时，就把它送给山上一位在金城银行工作的朋友——他们家喂狗的饭，当然比我们家的好得多，但是听说这小狗不肯呆在金城银行的宿舍，却跑回来饿死在我们山宅的廊上！

现在北京城不准养狗了，我小女儿还是去抱了一只小白猫。我们都喜欢白色的长毛猫——在这点上，我和我的爱猫的朋友夏衍同志对于猫的毛色优劣的评定，恰好相反！他的名次是黄、黑、花、白。他总爱养黄猫，还是短毛的，可是他的黄猫常常跑了就不回来。据说他最近又抱了两只小黄猫，但愿它们再不走失！

我小女儿的这只小白猫，叫“咪咪”，雪白的长毛，眼睛却不是蓝的，大概是个“混血儿”吧。它是全家的宠儿。它却很居傲，懒洋洋地不爱理人。我当然不管给它煮鱼，也不给它洗澡，只在上下午的一定时间内给它一点鱼干吃。到时候它就记得跑来，跳到我书桌上，用毛茸茸的头来顶我，我给它吃完了，指着一张小沙发，说“睡觉去！”它就乖乖地跳上去，闻闻沙发上的垫子，蜷卧了下去，一睡就是半天。

在白天，我的第二代人教书去了，第三代人上学去了，我自己又懒得看书或写信的时候，一只小猫便也是个很好的伴侣。

1986年5月3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6年6月13日。）

致 陈 祖 芬

祖芬：

你弟弟祖德寄给我一本《超越自我》，我十分欣赏，我不懂棋艺，但对于他在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处世之道等，我都很佩服。我打你的电话总是不通，他的电话（你母亲给我的）也打不通，不知什么缘故！请你得信后，把你的电话和他的住址和电话，重新告诉我。

听说你又出差了，你真忙。我还好。问你母亲好。

冰 心

五、卅一、一九八六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臧 克 家

克家同志：

昨天令爱苏伊夫妇来，带给我您的文集等五本，感谢之至。因为星期日来人多，今晨才能翻阅，真是洋洋万言！我只先看了《青柯小朵集》，您对朋友的深情，跃然纸上！从这几十篇中，使我又回忆了许多人，“百感都随流水去”，您写时有什么心情？

祝

笔健 并请双安

冰 心

六、九、一九八六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吴 海 发^①

海发同志：

来信和剪报均收入，大著^②中有几处不准确，请阅。我现在行动不便，不能去江阴了，甚歉。万象书局出版的《冰心选集》，肯定是盗印，因为我没有在该书局出版过书！

顺颂

近安

冰 心

六、十八

① 吴海发，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② 《吴文藻与冰心结伴归故乡》，载《无锡日报》1986 年 5 月 23 日。

我的祝贺

文汇报《笔会》自创刊以来已是四十周年了！在此四十年之中，它团结和调动了当时许多的文艺工作者，对进步的文学事业，做出很大的成绩。解放后，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二年，为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提倡文学作品题材风格形式多样化，又做了很大的努力。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把“齐放”与“争鸣”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笔会》被迫停刊。但这段空白，恰恰是《笔会》刊行史上光荣的一页！粉碎“四人帮”后，《笔会》复刊了，我记得我曾为它写过《我和上海》、《记叶老和巴金》等短文，表示我的支持。现在，在它庆祝四十周年之际，我祝愿它乘胜前进，团结调动起更多更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上更大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6年7月15日。）

好好地写，前途无量

——为《中学生散文选评》序

中学生文学习作年度选本的散文部分有四十篇，我只看了六篇，但每篇都看了不止一遍。这些习作是从全国中学生本年度的文学习作中精选出来的，当然都是较好的。仅就我看的六篇来说，它们对所描写的人，物和境，都有很诚挚和独到的情感和见解。我以为这些小作者在他们已有的写作工夫上，再好好地写下去，前途是无量的。但作为一个写了大半辈子散文的老人，我应该把自己写作的失败教训告诉小作者，希望他们在前进的路途上，要躲过这些绊脚石！

第一，散文忌“散”。在你文思若涌的时候，一定要咬住使你动情的“人”或“物”的一点，围绕着这一点写下去，情尽笔止，不要游离于这一点以外的其他事物。第二，在用字造句上也要切合当时当地的

真实情境。在描写雪景时，不要刮起秋风。在赞赏红花时，不要泛用“嫣红姹紫”字样。如此等等。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小作者以为如何？

1986 年 6 月 28 日

（《中学生散文选评》，作家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初版。）

给夏令营盲童朋友们的一封信

亲爱的盲童朋友们：

昨天，有《中国盲童文学杂志》主编徐伯仓同志来看我，说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要在首都北京召开了。这消息使我十分激动而高兴！

小朋友们，人一生下来，不是只有一对眼睛，我们还有一对耳朵一个鼻子和一张嘴，以及能感觉到一切事物的一双手、一双脚和周身的皮肤。因此，我们的感觉中，除了视觉以外，还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等等。而且往往因为失去了一种感觉，而其他种种的感觉都会格外地灵敏起来。比如你们虽然双目失明，而这次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一定会感觉到北京的空气是那样地干燥而清凉，北京的街道是那样地漫长而宽阔，北京街上的来往行人是那样地众多，北京人民尤其是小朋友们对你们是那样地爱护和亲切。你们虽然看不见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故宫等处的形象和色彩，但是你们从走进荫凉的门洞，走

上一层又一层的高大台阶，不管你们脚下踩的是水泥地，是玉石还是地毯，从走路的长短上，从听到天安门洞、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大殿里空旷的声音上，你都会感觉到这些建筑的雄伟和壮丽。特别是当你听到天坛回音壁前清朗的回音，闻到天坛玫瑰园里扑鼻的香气时，当你登上雄伟的万里长城，迎着扑面而来的大风，摸到巨大的城砖时，你不能不从心底感到我们祖国文化的悠久。当你听到特别为你们组织的报告会和音乐会时，你们的激动和欢乐，一定比我们只用双目观看的人们，要深刻精细得多！

亲爱的小朋友，我恳切地请你们把这次来北京开会的种种感觉，用针刺的文字或用语言告诉我们，使广大的读者和听众都能分享你们的快乐，而且从你们的叙述里，学会到用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天赋的灵敏的感官。

祝愿你们有一个圆满欢畅的夏令营生活！

你们忠诚的朋友 冰 心

1986 年 7 月 4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1986 年第 4 期。）

当教师的快乐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 Fac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

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和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

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者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关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1986 年 7 月 7 日大雨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 年 9 月 24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但你的近况，我都知道，因为吴泰昌常给小林打电话。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吗？你还记得大概是八二年吧，你到北京，同小林夫妇和罗荪在我家照了许多相片，这胶片让大周明拿去洗了，直到今天才拿来！兹寄上，那时文藻还在世，真是年纪不饶人呵！其中有一张小林搂着你，特别好玩，是否？我一切如恒，反正是活一天干一天，有时觉得日子过的太慢了。吴青他们也都想你和小林一家，他们这两天正忙考学生。孩子们也都好。请你保重，不要多见人，我知道这是最累的，小林要把一下关！愿你健康！

大 姐

七、十三、一九八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我很喜欢陈祖德这一家子

——喜读《超越自我》

前些日子，我在每天午休时间，收听并欣赏陈祖德的自传《超越自我》。这本自传的故事本身和播音员的雄浑的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的亲切声音，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正在这时，祖德同志又送给我这本书。我爱不释手地看了两遍。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不但是个第一流的棋手，也是个第一流的作家！

真挚是创作的灵魂。祖德同志写这本书时，也许以为这本书将是他的绝笔了，他要趁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他的事业、他的感谢、他的拚搏、他的爱憎和他的希望（参看第十四章）呕心沥血地倾吐出来，这一种神魂奔赴的挚诚，使得这一本《超越自我》，在我的眼中成了一本高出一般文学作品的杰作。

从这本书里，我认识了祖德自己和他周围的一

切，也就是祖德之所以成为陈祖德的社会因素。

他出生在一个健康和谐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他有爱护培育他的父母和姐姐——他的父亲教他下围棋，为他寻师访友。他的母亲以老迈之身还一字一划地为他抄写书稿。他的姐姐对他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帮他择偶，促他上进。这个团结互助的家庭，造成了他的自尊、自信、自强和乐观奋进的人格。使他在无论什么环境、和什么样的人相处、特别是工人和农民都会感到快乐都能看出对方的优点。他爱憎分明，他不怕说出自己灵魂深处的眷恋和憎恶……

围棋是他的生命，这围棋又是中国的国粹。他用国防前线战士一般的、誓死保卫祖国的精力，来对待国际棋赛。他不但自己竭力拼搏，也在尽力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这本书里警句很多，真是妙语如珠，表现了许多他在实践中的颖悟，如：

我也是通过我这一生的实践，才真正认识了自己。

我们在下棋的同时，也在学做人。

一个棋手只有在赛场上才能焕发出生命

力，才能取得胜利的欢乐。人生没有这样的欢乐，简直如死水一般。

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

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抉择，其实都是一个能不能自我战胜、能不能超脱的过程。

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是在忘却自我中获得自我的。

一个人拼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过自我的过程。

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从而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

他热爱祖国，他认为：

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围棋是中华民族
的国技，是炎黄子孙的国粹。

因此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围棋事业。他在重病时
刻，不能不殷切地挂念着他的接班人。他想：

一个人能鼓励别人超过他，帮助别人超过
他，这得有多高的境界。

每个强者都有他的黄金时代。他的黄金时
代越短，则事业的发展越快。

眼看后起之秀要跑到前面，同样需要超越
自己，欢迎别人战胜自己。

这时，祖德已经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他已经
超越了自己。这就是我对这位年轻朋友所最拜服的
地方！

说起也有意思，我在他的一家人中，最先认识的
是郑敏之，那位爽朗俊俏的乒乓球冠军。当我知道她
和围棋冠军陈祖德结婚时，我觉得他们真是珠联璧

合！在这本书里，祖德也欢快地写到他认准目标后是怎样地追求不舍，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是怎样地互爱互助。祖德说：

人最可爱的就是本色，自然，不做作，任何两人互相吸引，总有相同之点。

这又是一句真理！是的，磁石只吸引钢铁，而月亮也只吸引海潮。

此后，又通过一段文字因缘，我也认识了陈祖芬，又是一位很敏锐很可爱的报告文学作家。

总之，我很喜爱陈祖德这一家子！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好书第一版只印行了几千册，许多人想看却在书店里买不到。这样的杰作为什么不可以多印一些呢？

1986 年 7 月 21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6 年 10 月 18 日。）

教师节唤起的欢乐回忆

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同志来要我为教师节写一篇东西。

我这一辈子只教过八年的书，而且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对八十年代的读者来讲这些，真是古老的破烂。但是那几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师生之间的“友谊”，任何时候想起，都会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那是 1926 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岁。

我开了两门选修课目：“欧洲戏剧”和“习作”。上这两门课的都是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但我最喜欢教的还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国文”。这是燕京大学在郊外新校址开学的第一年，一年级的男女学生也特别多，几乎将近二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分在国文系主任马鉴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绍虞、顾随诸教授的班里。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闽粤籍的学生听不太懂他们的口音，教务处便把这些学生都

编在我的班里。一进课堂，他们齐刷刷地站起，从讲台上望去，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好奇地盯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候学生都称教师为“先生”——而他们的年纪也不过在十七到十九岁之间。和我自己的弟弟们一样年纪！我拿起点名簿，请他们自报姓名，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之后，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似乎已经很熟悉很亲切了！

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是“自传”，我要通过他们的自述，来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习惯、爱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几十本文卷，真像传记小说那样，极其活泼、真挚而且很长——如翁独健同志写的，就有四万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数，不写批语，只注重在每人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如他们是怎样写的？以及我对于他们的文章的意见等等。这样的课外单独交谈，加深了我们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时我们又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谈话的范围也很宽泛，我们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岛边的石舫上座谈，我们充分地享乐了我们的友谊。那时我们还没有“尊师爱生”的观念，我们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坐。我觉得我不但爱他们，也尊重他们。他们不但尊重我，而且也爱我！

我觉得不但年龄相近的师生之间，就是年纪较大的教师和中、小学生之间，也可以有很深的友谊。

我常常觉得小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越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就越自尊自爱，对教师也倍加亲切信赖，什么话都肯说、敢说。

当我们有了知心的学生朋友以后，我们的教学工作，就不是负担而是快乐了。

（本篇最初发表在《中国妇女》1986年第9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许久未得信了，但常从杂志上读到您的诗，真是雅兴不浅！卓如问您第五卷何时交稿，我没有意见。但是第四卷还未出来，朋友们都在问。

北京也热，不过常下雨，还好一点。您常给我寄书，每次我都收到，时感得您信，极高兴，千万不要以为“打扰”我就不写了。问您全家人好！

冰 心

七、廿六

致 刘 麟^①

刘麟同志：

信悉。我的书信没有人在编辑，因为我一般写信，三言两语，而且通信的朋友也不多，您要编当然可以，可能太费事了。

祝

笔健

冰 心

八、五

（此信由舒乙同志征集。）

① 刘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从航邮挂号寄上相片几张和一封信。算计应当到了，不见回音，十分惦念。不知你近体如何？吴青的儿子陈钢到上海，我让他呈上这封信。他喜欢照相，你就让他照几张，随便一些，只当他不在旁边更好。他常到文学馆去，说起来，我已告诉文学馆，我死后，一切有上下款的书籍书画，全部给文学馆。已送去的有上百本日文书，都是日本朋友送的，反正我也看不懂。听说小林他们到厦门去了，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

大 姐

八、七、一九八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忆 天 翼

在我没有见到天翼以前，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位作家。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像朋友。”母亲是个“多感的人……她又自信力很强，什么事都想试试看。”“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嗜好、行动，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对他最有影响的二姐“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她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他的父母和他的姐“都酷爱阅读文学作品，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们这方面的影响”。

他二十二岁就开始写小说。他自己说“小说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与我经常来往的人们。”提到在旧中国动乱时代写的小说时，他说：“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要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同时也要表

现受压迫的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帮助读者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该爱什么，恨什么。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我看了许多篇他对旧社会的牛鬼蛇神的嘻笑怒骂的小说以后，当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下的东屋，把我介绍给天翼时，我见到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凛然的人物，而是一张微笑的温蔼诚挚的脸，一双深沉的眼睛里洋溢着天真的温暖。我们一下子就熟悉了起来。他说他是丙午年生，属马的。我说：“那是和我的大弟弟同年了，比我小六岁”。我们都笑了，似乎心里涌起手足般的感情。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在一起座谈、开会，谈的是儿童文学创作。现在他的笔风完全变了，文章里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他和小孩子交朋友，写小孩子的故事，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天叔叔”。他写《蓉生在家里》、《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他希望新社会里的孩子们读了这些故事“能进步、能变得更好，或者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他对年轻的作者们更是循循善诱，和他们谈话时既慈蔼又严肃，因为他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肃的。

这一年，他和沈承宽同志结了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张章出世了。许多年来，她一直亲热地叫我“谢姑妈”。

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也都卷进“黑帮”的“龙卷风”里。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们作协的“老弱病残”的“黑帮”，也都先后到了湖北咸宁的干校。我和天翼等人干的是最轻的活——看菜地。遇到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并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边“聊天”，聊些天上地下与时事无关的事。

我在咸宁干校不到一个月，我又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我们的消息便隔绝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听说他也回来了。一九七七年，听说他在做健身操的时候，把腰弯下去，十指交叉双掌抵地后，就起不来了。他得了脑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为了“我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战胜疾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我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新作品。”

从那时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门西河沿一号楼的一段时期，我去看望他多次。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看见我来，他的笑容和那一双天真诚挚的眼睛，都对我说了许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说的话。我最记得的是在一次儿童的集会上我得到一条小朋友们送我的红领巾，我没有等到散会，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颈上的红

领巾解下来，系在他的颈上，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一九八〇年秋天，我从日本访问归来，又赶着翻译一本诗集，我也得了脑血栓，以后又摔坏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和天翼也无从见面。但我仍旧得到他的赠书，一九八〇年的《小说选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说集》扉页上还是自己签的字，“天翼”减笔为“天箴”，但笔力还是很刚劲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纯真最可爱的朋友。

沈承宽同志还是常来看我，逢年过节，我也得到张章夫妇给“谢姑妈”的贺片，已经结合起来的友情总是绵绵无尽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云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6年9月13日。）

说 梦

我从一九八〇年秋天得病后，不良于行，已有六年之久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我几乎每夜都做着极其欢快而绚丽的梦。我会见了已故或久别的亲朋，我漫游了五洲四海的奇境。白天，我的躯壳困居在小楼里，枯坐在书案前；夜晚中，我的梦魂却飘飘然到处遨游，补偿了我白天的寂寞。

这些好梦要归功于我每天收到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的来信和赠书，以及种种的中外日报月刊。这些书信和刊物，内容纷纭繁杂，包罗万象，于是我脑海中这千百朵飞溅的浪花，在夜里就交织重叠地呈现出神妙而奇丽的画面！

我梦见我的父母亲和我谈话，这背景不是童年久住的北京中剪子巷，而似乎是在泰山顶上的南天门。母亲仍旧微笑着，父亲拍我的肩头，指点我看半山茫茫的云海和潺潺的飞泉。

我梦见在美国的母校慰冰湖上，轻轻地一篙点开，小船就荡出好远，却听见背后湖岸上有美国同学呼唤：“中国有信来了，快回来看吧！”

我梦见在日本东京一排高楼中间，凹进一处的、静雅的“福田家”小餐馆里，在洁无纤尘的地席上与日本朋友们围坐在一张矮几边，一边饮着清淡的白酒，一边吃着我特别欣赏的辛辣的生鱼片。

我梦见我独自站在法国巴黎罗浮宫的台阶上，眼前圆圆大花坛里分片栽着的红、紫、黄、白的郁金香，四色交辉，流光溢彩！从那里我又走到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静静地看着过往的穿着淡青色和浅黄色春装的俏雅女郎。

我梦见我从意大利罗马的博物院里出来，走到转弯抹角都是流泉的石板路上，又进到一座壮丽的大教堂里，肃立在人群后面，静听坚实清脆的圣诗歌咏队的童音。

我梦见在高空的飞机窗内，下望茫茫无边的淡黄的沙漠，中间横穿过一条滚滚滔滔的尼罗河。从两岸长长的青翠的柳树荫中，露出了古国埃及伟大建筑的顶尖。

我梦见……这些梦里都有我喜爱的风景和我眷恋的人物，醒来也总是“晓枕心气清，奇泪忽盈把”。梦中当然欢乐，醒后却又有些辛酸。但我的灵魂寻到

了一个高旷无际的自由世界，这是我的躯壳所寻不到的。我愿以我的“奇泪”和一缕情思，奉献给我海外的梦中人物！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9月15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你的信我也早收到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是有人来，就是有事，耽误至今。现在陈钢也回来了，带回你的许多相片。吴泰昌也来了，带回你和小林一家的消息，都使我快慰。特别是你说你的《随想录》就要送去了，印出后当然有我的一本。今年夏天我也没有去烟台，一来北京多雨，并不太热；二来走路不便之后，也觉得一动不如一静。小林夫妇到厦门去了，他们印象如何？老巴，你来信没有提到我寄你的那些相片，我觉得小林搂着你的肩头那一张，特别可爱，不是吗？请多保重，问你一家好！

大 姐

九、四、一九八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为《崛起》题词

年轻的时候
会写点东西的都是诗人
是不是真正的诗人
要看到他年老的时候。

冰 心

1986 年 9 月 6 日

致 周 达 宝

达宝同志：

您的信和君子兰，照片，和四本《吉檀迦利》，都收到了，十分感谢！君子兰有那么繁盛好看的花，真不错。我这盆君子兰摆在窗台上的，还只有六对叶子，也不知何日开花？也不知我等得着否？花开时我家里倒是有照相的人，我女儿吴青的孩子（陈钢）喜欢照相，还特爱给花卉照相。你家住址在哪里？天天上班吗？祝好！

冰 心

九、九、一九八六

我和北京

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我写过不只一篇的“我和北京”的文字。一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总有说不完的话。

我小时候对北京的“想象”并不太好。我的同盟会员的舅舅们常对幼稚的我，讲许多那时在北京的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使得我对政府所在地的北京，也起了厌恶。当我在一九一三年初到北京时，我才十三岁，马车穿过厚厚的灰色的城墙，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进入泥泞窄小的胡同，又走入小小的三合院的房子时，在海阔天空的山东烟台和山青水秀的福建福州度过童年的我，忽然觉得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我喜爱北京，是从接触北京的旗人开始的。当然以后还有老舍和罗莘田。

住在邻院的房东——齐老太太的一家，从我们一住进来，就过来招呼我。齐家本姓析（后来我听一

位满族的医生朋友告诉我，旗人最普通的姓有八个，就是佟、关、马、索、析、富、安、郎），民国成立后，她们才改了汉姓。她教给我许多有礼貌的语言，如对长辈或生客应当称“您”，踩人一脚应该快说“对不起”，请人做事或帮忙，别忘了说声“劳驾”，请人让道时，要说“借光”。这些话说和听起来都十分客气，清脆而悦耳。她还常请我去“听”戏，我小时在烟台，父亲也带我去看过三国的戏，我们南方人只会看而不会“听”。我们头一次“听”的是梅兰芳和王凤卿先生的《汾河湾》。我不但惊叹了演员形象的俏丽和英武，也喜爱了唱腔的柔婉与苍凉，从此，我爱上了京戏。

那时北京的宫殿园林还没有对老百姓开放，我首先瞻仰的是西山的寺庙。我上了中学，一九一七年以后，参加了几次女学生夏令会，游迹到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处。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从西直门到西山是骑驴去的。我一跨上驴背，忽然忆起少时骑马的技术，虽然小驴不像老马那么听话，我还能扬鞭催它快跑。结果，那天在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到达卧佛寺的。

以后，北京的名胜，逐渐对老百姓开放了。我惊叹一切巍峨宫殿的玉石层阶、回廊、栏杆……而我最爱的是天坛！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坛，穿过两旁耸天的苍翠古柏，抬头望见圆圆的石基上那座圆圆覆盖着

三层海水般蔚蓝的琉璃瓦的古建筑时，我竟然流下了皈依的眼泪！其次就是景山，只因为从这座小小的山顶下望，北京伟大的紫禁城全景，尽收眼底。从那时起，每逢有外国朋友来到北京，问我要先参观哪一处名胜时，我总说：北京可看的名胜多了，但天坛是不可不去，景山是不可不上的。

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国去求学，看到人家绿化的新大陆，有着无限的羡慕。我在《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中曾慨叹地说：“……故乡没有葱绿的树林，故乡没有连阡的芳草。北京只有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故乡，我的北京，是一无所有。”但在我寄母亲的信中，我却说：“北京纵是一无所有，但她有了我的爱，有了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墙里，住着我喜爱的一切的人。飞扬的尘土呵，何时容我再嗅到我故乡的香气？”

一九二六年我从国外回来，直到一九三八年我黯然地离开沦陷的北平时，北平的“灰暗”，都没有改变。我离开故都南下西去，车走过“五四”时代金碧剥落、荒凉空旷的天安门城楼前，不由得联想起萨都刺《金陵怀古》中“荒烟衰草乱鸦斜日”之句，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怆和愤激！

此后我在云南、四川、日本一共呆了流离颠沛的

十几年。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一切都改观了。我惊喜地看到我的北京换上了整洁华彩的新装！尘土飞扬的街道和泥泞的小胡同不见了，大街小巷开始铺上柏油。人力车没有了，代之以川流不息的公共汽车，和其他种种的汽车。天安门上是装修过的红墙黄瓦、金碧辉煌。以后的几年里，灰色的城墙拆除了，只留下壮观的前门和箭楼。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建起来，石板覆盖的天安门广场也开阔了。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我曾观看过整齐雄壮、旗帜飘扬的国庆游行队伍和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受侵略、受压迫民族的群众大会……这些盛况是我年轻时代所梦想不到的。

十年浩劫期内，有一半时间我不在北京。但这时的北京不提它也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又容光焕发了！街头的树木添栽了，松墙剪齐了，新砌的花畦里闪耀着点点鲜艳的红花。虽然北京雨少天旱，从塞外沙漠还不时吹来漫天的沙土，但北京还坚持在路边街头种上耐旱的萋萋芳草。病后六年我很少出门，从每月一次去到医院的的车窗中往外望，我高兴地看到从西郊到东城区这一路上的葱茏的树木和畅茂的花草，特别是天安门前的花坛草地，夏天以来的颜色，逐次加

浓……

我知道北京的市容从今起会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更加美丽、更加整齐、更加现代化。年轻一代的北京人，正在努力耕耘，而我已经在享受着收获的快乐！

1986 年 9 月 12 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学习与研究》1986 年第 11 期。）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昨天作协转来一摞的小朋友来信中，有一封是给您的，兹附上，请查收。

近体如何？千万珍摄。清阁寄来您回忆文革 20 年的文章，阅之慨然，您还没有经过“反右”，在我们，“文革”已不算什么了！

大 姐

九、廿六、一九八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孩子心中的文革》序

晚报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的稿子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十年中的个人经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和一百个当时的孩子今天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那时全国百十万个血气方刚、好奇而又无知的男女青年，在林彪、“四人帮”这几个跳梁小丑的教唆下，只因受到了几次伟大领袖的接见，就俨然觉得一身绿军装，一根皮带，一条红卫兵袖章，就可以比当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拥有更大的权威！巴金说“……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苦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可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在孩子的“难忘一事”中，就有吴晗和田汉挨斗的惨状，

以及一位校长让学生用图钉打脸等事实，看到和忆起都使我气愤填膺！

我认为三座大山中，“封建主义”在那时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彻底被打倒过，帝王、神仙和救世主的思想，也都存在。我们在六十多年前的“五四”游行中所要求的“民主”，也是最近八年，才露出曙光。

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1986 年 10 月 3 日晨急就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86 年 11 月 7 日。）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您的信早收到了，四卷本出来，但尚未收到，不忙。（五卷我已请卓如寄出）。

我最近病了几天，因发烧竟至卧床不起。大家来信，总祝我健康长寿，长寿而不健康，究竟没有意思。您说常看见我的文字，那都是“任务”，手边还有许多！我只想将文藻生平下半段写完，但太复杂，也太多。巴金的《二十年前》，我已看过，好极了！文汇的反响请剪下寄来，他还没经过“反右”呢！正好《北京晚报》有一本《孩子心中的文革》让我写序，我也发泄了些感情。病后腕弱，其余等书到再复。你的题字，我一定写，《无声的雨》已拜读几遍了。祝笔健！

冰 心

十、八、一九八六

愿从今年开始 年年都是国际和平年！

我是一个生于忧患的孩子，
年轻的岁月都在
霸权主义的铁蹄下度过！
我咬着牙齿拒听东西列强的
“和平人士”高唱国际和平的声音。
直到我们自己的百十年来
饱经痛苦的人民在自己的
党的领导下凝聚起无穷的力量
一举而把霸权主义者
推翻在地，
我才和六亿同胞在一起
抬头看见了天，呼吸了新鲜空气！
相信自己的和天下人民的力量吧！
任何一种杀伤力最大的核武器，
都抵抗不了亿万天下人民
保卫国际和平的力量！

让天下人民都“将心比心”，
想着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想着自己国家的壮丽的江山
雄伟的国都
和可爱的孩子……
让天下人民都举起如林的手臂，
对制造和使用核武器的
少数战争狂人宣告“罢工”！
让我们亿万人民同声地唱出
这首高亢激昂的国际和平之歌，
让那些战争狂人在响彻云霄的
歌声的振荡中
永远、永远地消灭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友声》1986年第20期。）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文集（精装 58 本，平装 54 本）都收到了。送您一本精装的，已交给杨流昌同志（他是王蒙的秘书，月底可到沪开会。）《无声的雨》的评论，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以一小笔代替，抱歉之至。勿上并祝笔健！

冰 心

十、廿四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真挚是诗的灵魂，《无声的雨》是作者心灵深处出来的句子，谨以杜陵老人诗以代评语，
并博
宫玺诗人一笑

冰 心

丙寅孟冬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文学馆的刘麟同志想借看我给您的信，不知可不可以？

我最近将一切字画，人家送我的，除了现在挂在墙上的，都给了文学馆，刘麟可以告诉你一切。

吴青说小林送我一个垫子，至今吴泰昌仍未送来，他真忙得像没头苍蝇了！问好！

大 姐

十、卅一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刘麟同志要到您那里借用我给您的那些信，可不可以？

今天魏帆来，我才知道李晓就是棠棠！他写作是有前途的，您是太认真了，他写的《继续操练》就比您的小说“看得透”得多，也“超脱”得多。请对他说，“谢姑妈”欣赏他。勿上。

大 姐

十、卅一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陈 祖 芬

祖芬同志：

又蒙你赐书，我已看了，你真是多产，精力充沛是好事，但也不要过劳！

前些日子也得了祖德的信，他们也不错。

我还好，足不出户，避免了许多应酬，但是客人还是免不了，人家也是好意。问你母亲好，孩子好。勿上。

冰 心

十一、九、一九八六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茶叶故乡”的故乡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我的故乡福建，更是茶叶故乡的故乡！福建茶叶的种类，多至好几十个，而我们的家传都是喜欢喝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带有烘过茉莉的清香，而且泡茶时也不必用陶壶小杯等的讲究！记得一九一一年我从山东回到故乡福建福州的时候，看见我的祖父吃茶是很讲究的，他泡茶的水，不是井水而是雨水。福州多雨，一阵大雨过后，屋瓦彻底干净了，我们就把屋檐上的雨水，用竹管引到大木盖上开有小盖的大水缸里，泡茶时打开小木盖用小水勺舀出储存的雨水来煮沸。他说雨水是净化了的，没有土味。以后我跟父母到了北京，雨少天旱，没法子用雨水泡茶了，但父亲在盖碗里放上很多茶叶，说是要使茶香盖过水味。现在我自饮或待客，用的茶叶也还是茉莉花茶，而泡茶用的水，不但雨水，连井水也没有了，我用的是带有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但我觉得饮茶总比饮水好，茶，更为有味而

健脑清神。

1986 年 11 月 12 日

民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进中央妇女工作座谈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了，这是民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民进会员本来多属文教方面的人士，妇女会员又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文教方面半边天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通过这次的工作座谈会，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的新形势、新格局和新任务，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努力地发展我们的工作，我因病不能参加座谈会，愧憾之余，特此书贺！

谢冰心

1986 年 11 月 15 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十一月十二日的信收到了，您将我给您和萧珊的信都给刘麟同志，他已有信报告我了。现在要问您两个问题：（一）是我托王蒙的秘书杨流昌同志给您送去《冰心文集》四卷一本，内附相片，收到没有？（二）您没有答复我李晓就是棠棠的问题。听您说您相当疲乏，一定不要再陷入文山会海！我已六年足不出户了，但来客仍不少。奈何？知道您喜欢水上勉的录相，我很高兴，有空多写信吧。祝好！

大 姐

一九八六、十一、十七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抒情的原野》收到了，也拜读了，又是一本好诗。

我曾托王蒙同志的秘书杨流昌同志给您带去一本精装的文集四卷，上面签了字，不知收到没有？稿酬也至今未收到，不知是否汇到魏公村有问题？

我还好，就是忙些，人事劳劳，光阴草草，冬寒望珍重！

冰 心

十一、十七、一九八六

谈巴金的《随想录》

袁鹰来信说：“巴金同志的《随想录》，有的同志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之作，我很同意这种评价……不知您有没有兴致和时间写一两千字……”

我不但有兴致，而且有愿望，但是时间就难说了！

我打开巴金送我的已出版的随想录第四卷《病中集》，在第一篇的《干扰》里就有这样的话：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

看到“抢救”两个字时，我痛苦地微笑了，这正是每当我“答问”和坐着让人照相时，所常有的想法。在《一篇序文》的结束语中，巴金说：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作违心的事。”

“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巴金的散文之所以被推崇为“当代散文的巅峰”，就是因为在他的每篇散文里，句句都是真心话！

在《愿化泥土》这篇里，他说：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使我猛然想起龚定庵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它代表了一切热爱祖国，热爱后人的“温暖的脚印”的人的愿望。

这和下面一篇的《掏一把出来》里所写的：“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是一个意思！

在《为〈新文学大系〉作序》这一篇里，有个警句，他说：“我记得有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

近来，我常得到各种散文刊物编辑的来信，让我推荐一篇好散文，我手头的散文刊物不算太少，但是看来看去，竟难得挑出一篇可以算作“好”的。我觉得现在不但有了“朦胧诗”，也有了“朦胧散文”，也许是我太浅薄，也许是我赶不上时代，现在的确有许多散文，在我看来，都是朦朦胧胧的不知所云。作者若是不敢写出真心话，又何必让读者浪费猜谜的时间呢？

这又和下一篇《我的仓库》有了联系。

巴金说：“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作……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这末一句，讲得多么彻底！

《病中集》翻到最后了，巴金在《我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说，“十年的‘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柜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

巴金今年八月四月写给我的信中说“……我的随想录第五册就要脱稿了，还差一篇文章。说了自己想说的，总算没有辜负我这支笔，本月内一定编好送出去。您也替我高兴吧。”在他十一月十二日写的信中说：“我说搁笔，也是真话，并非不想写，只是精力不够。这大半年相当疲乏，我担心随时会垮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却想多活，只是为了想多看，多思考，的确我们需要好好地思考。”

从我同他和萧珊的几十年的友谊经验中，我想

象到，在他的“多思考”的时候一定还会回忆萧珊！《病中集》的末一篇就是《再忆萧珊》。

在我自己的回忆中，萧珊是一个十分活泼天真，十分聪明可爱的大姑娘！她在替《收获》催稿时，甚至调皮地以“再不来稿，我可要上吊了！”这样的话来威胁我。至今我的箱底还压着一件咖啡色绉绸的丝绵袄，面子就是她送的。

巴金的《怀念萧珊》，我记得是在萧珊去世六年以后才动笔的。这篇“再忆”是写在萧珊去世十二年之后了！他说“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他在梦中还会忆起萧珊说过的话，如：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子呵！”

“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呵？！”

巴金还是有勇气的巴金！他最后说：“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病中集》翻完了，巴金最后的话也抄到此为止。

自从一九八〇年夏同巴金一起到日本访问回来，不久，我就得了脑血栓。病后，神经似乎脆弱了许多，独自的时候看到好文章或好事，就会笑出声来；读到或是遇到不幸的事，就会不自主地落泪，虽然在人们面前，我还能尽力控制。

这次在一边看《病中集》，一边笔不停挥地写着，因为旁边没有人，我又悄悄地落了眼泪，这眼泪是《病中集》中的“真话”催下来的。我也说句真话吧！

1986 年 12 月 2 日浓阴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世界》1987 年第 1 期。）

致 陈 祖 芬

祖芬同志：

你的第二本书收到了，谢谢。

你先忙你的采访吧，别着急来看我。我这些日子很弱，来前请打电话！问你和祖德好。

冰 心

十二、二

（此信系周达宝同志征集）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信早收到了，因为等款到一齐复。前天已收到稿费，兹将收据附上，请代交财务科。

您说的文集里未载入的诗文，我都忘记了（茅盾那一篇会有的，可能在五卷内，因为他死的晚些）。您记得的东西，不妨加入，卓如一定欣赏。

何时到北京来，请枉过。勿复请安！

冰 心

十二、三、一九八六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附上尊照一张，是吴青的儿子陈钢给您照的，他请您签字再寄回给他。问你们全家，亲亲第三代！

大 姐

一九八六、十二、九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一代的崇高女性

——纪念吴贻芳先生

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记得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

从那时起，我心里就铭刻上这一位女教育家的可敬可爱的印象，我时常勉励自己，要以这形象为楷模。

我和她见面较多的时期，是在一九四一年以后

的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她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那时坐在旁边的董必武同志，这位可敬的老共产党员，常常低低地对我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我听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女性的自豪。

吴贻芳先生常住南京，我则常住北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解放后，因为我们同是全国人大代表，更因为她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我们在一起开会时，谈话就多了。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教育家。她的一言一行，都表现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忠诚于教育事业。她是一位老留美学生，曾多次赴美开国际会议。她学贯中西，也誉满中外！一九七九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女校友会授予她“智慧女神”奖，我觉得这个称号她是当之无愧的。

她是我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与世长辞了。但像她这样的人物是不朽的。她的桃李遍天下，敬佩者更是不少。她的崇高的人格与影响，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要努力向她学习。

(本篇刊载于《吴贻芳纪念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8 月初版。)

《旅游英语会话》序

福建科技出版社将《旅游英语会话》课本三册和录音带一并寄来，要我作序。我的英语水平不高，又因离开故乡已有数十年之久，对于福州近况，都不熟悉；但从阅读课本，聆听录音之中，欣悉福州在精神和物质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课本最后还有关于国际社会文化各方面很精彩的讨论。交谈中的英语语调也很正确流利。关于这份教材的评价，本书的美籍教授布莱德雷和奥尔良的序言，谈得很恰当详尽，我就不多赞一词了，是为序。

冰 心

1986 年 12 月 11 日北京

致《小号手报》的记者们

《小号手报》的记者们：

报和信都收到，十分感谢！遵嘱写了报名寄上，我的字不好，看能用就用吧。你报办得不错，栏目很多，内容亦很精彩，当你报庆祝创刊两周年之际，并祝愿《小号手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冰 心

十二、十四、一九八六

（此信最初发表于《小号手报》1987 年 1 月第 25 期）

为《青少年日记》题词

《青少年日记》编得很好，栏目很多，封面也不错。我认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只要能把自己对这一天周围一切事物的真情实感，自由畅快地写下去，留下心泉流过的痕迹，就好。当然，应人之请，也可以公开，这是我的一点意见。

冰 心

十二、十四、一九八六

（题词最初发表于《青少年日记》1987年第4期。）

给小朋友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全国少年接力丛书编委会《岭南少年报》的记者将收到的征文中几封写给我的信，从快邮中寄来，要我作复。我读了这几封从天南海北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我十分感谢你们对我的敬爱和信赖！我几乎每天都得到从中国作协和许多儿童刊物出版社转来的小朋友的信，谈的都是和你们类似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种种情况。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作一个总的答复。

1. 你们都有“将来要作一个作家”的理想。这理想是好的、积极的。但是到底能否成为一个作家，是要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的。为写作而写作，没有真实情感的文章，是不会得到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的。这一点愿你们牢牢记住。

2. 你们的写作，都得过奖赏，但有时也不免受

到讥讽嘲笑。我认为对待这种讥讽，首先是虚心自省，其次是淡然处之。只要你认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积极的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效果的，就要坚持下去。

3. 从你们信中看到许多你们的父母和师长给你们的教导和支持，我十分感佩他们，请你们代我向他们致敬！

你们热情忠实的朋友

冰 心

1986 年 12 月 15 日

致 葛 翠 琳

翠琳：

《蓝翅鸟》收入，甚谢。剪报、相片和拜年片同时到达。那位陆久之，我没有接触过，文藻知道否，现在也无从问起了。

《寻贝集》写好，不知可用否？勿上
问
全家好！

冰 心

十二、十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我这一辈子 还未有过可称为“书斋”的书斋

实话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一间可以真正称为书斋的书斋！

我的父亲曾有一间书斋，虽然很小，不到十二平方米吧。那是在一所小三合院里的东厢房两明一暗的小三间里。明的一间做了客厅，“一暗”的一间就做了书斋。

这小书斋里靠着北墙是一个书柜，上半截是两扇玻璃门，里面摆些中外书籍，我只记得汉文的有《饮冰室文集》等。中间是两个抽屉，收藏着许多老朋友的来信和他们写的诗文。下半截是两扇板门，放着线装书和纸张等等。西窗下是一张横放着的书桌，上面摆着笔架、砚台，图章和印泥盒，桌前一张有靠背的椅子。靠东壁也是两张直背椅，中间摆个茶几，茶几上摆着茶具，这小屋里就满了。这只茶几上面的

墙上挂有一张横幅，上面是棵松树，并题有诗句，是哪位伯伯送的就记不得了。

当时手种稚松小，
今日量身已十围。
不作龙鳞作鹤盖，
误她华表倘来归。

这间书斋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父亲和我多次的谈话，如谈“灯塔”都是在这间小小的书斋里进行的。

我呢，自从会读书写字起，都是在卧室的窗前，摆一张小小的书桌，书桌旁边放一个小小的书架，如此而已。在我教书和译书时，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那里没有卧床，但办公室不是我一个人的，左右和对面也都有书桌。

以往的几十年中，在国内，在海外，也有不在卧室里放书桌的时候，但这种时间很短，书架上也没有多少书，因为书籍大多丧失了！

现在呢，也是卧室窗前放着书桌，可是这间屋子较大，窗子又大又亮。我有七个书柜，三个摆在客厅里，卧室窗前的两壁还可以摆下四个！（近年来得的赠书多了，不得不挑出一些放在甬道的墙柜里。）现

在这间卧室兼书斋，倒是窗明几净。窗台上放着一盆君子兰，是朋友送的，我不会伺候，也只长叶子，不知何时才能开花。桌上有时有一瓶玫瑰，也有笔筒、砚台、桌灯、日历等等，还有两本字典：一本是小小的《英华大辞典》，一本是《新华字典》，因为不论是写汉文或看英文，我往往提笔忘字，或是英文一个字不会“拼了”就得求助于这两本小小的字典。

这个“半间”的书斋里，还常常有客人。近年来，我行动不便，除非是生客，或是客人多了，我才起来到客厅去。因此熟人来了，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一来就走进我的书斋，这里往往是笑语纷纭，真是“谈笑有鸿儒”。这些鸿儒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免得有“借光”之嫌。

除此之外，白天，我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孩子出去上课了，这屋里便静悄悄的。我的伴侣——陈珣同志（她是我小女婿的姐姐）只在客厅坐着看书或织活，有电话或有客人，她才进来通知我。还有，就是我女儿的那只宝贝猫咪咪，它上下午两次必跳上我的书桌，坐在我的信笺或稿纸上，来向我要鱼干吃之外，余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有的是时间来写作。我的客人不少，电话也多，我有许多信件要复，我有许多书刊要看，此外，杂务还多着呢！若不是今天的大

雪，把我纷扬的心绪压了下来，这篇“我的书斋”还不知何时才能交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7 年 1 月 3 日。）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三十多年前，我曾请朋友王世襄为我刻两枚闲章，一枚是“歌乐山人”，因为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住过。另一枚是“无佛处士”，因为我仿佛记得有一位古诗人说过“无佛处，我称尊”，我觉得这句话很幽默而俊逸！前些天他来看我，我说“请你再替我刻一枚‘是为贼’的闲章”，他微笑着不置可否，也不知他到底刻了没有？

我这话说远了！只因我近来常常觉得闲居无聊，应当料理一些该趁早料理的事了。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著作。这些财宝，我一生中已经丧失了好几次。第一次是“七七事变”，第二次是“反右”期间，第三次是十年动乱，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但是近年来又从箱底找出几幅旧的，再加上一些新的，都存放在柜子和箱子里，我想如果我一旦悄悄地走了，我的那些第二代、第三代人对这些我所珍贵的东西将手足

无措，还有可能散失，这时我就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负责筹建的。文学馆的工作人员中，还有我的好友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个电话，他就笑嘻嘻地来了。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将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九十多本日文著作捐给文学馆了。近十年来，中外朋友的赠书越来越多，我的几个书架放不下了，只好先打发一些。我还和舒乙他们说好，将来我书架上的书，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给他们，现在就先送走这批字画，这里面有汤定之、陈伏卢、沈尹默等老前辈的字和画，时人萧淑芳、胡絮青等的字和画，其中最多的是赵朴初同志的字，因为他常把近作的诗词寄给我看。此外还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画等。那天舒乙他们来了，看见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画卷轴，就摇头说：“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车装！”第二天他们果然开了辆面包车来了，当他们几个人轻轻地托起这些字画下楼去时，我忽然觉得欢快地“了”了一桩大事，心里踏实得多了！现在仅有的的是挂在客厅墙上的吴作人的熊猫和梁任公前辈替我写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副对联，还有卧室兼书斋的墙上挂的我的祖父子修公自写的诗，赵朴初的字，以及陈宇化画的玫瑰花，上面有黄苗子题的诗。以上这几幅字画，将来我“走”后也都要捐给

文学馆。

海外的朋友们看到这篇东西，不要以为我真的要“走”了，想“走”还真是不容易！就在交出字画的头一天，我照例去北京医院做一月一次的“体检”。大夫和护士都笑着对我说“心电图上显示出的你的心，和年轻人的一模一样！”因此我才敢请王世襄给我刻那枚“是为贼”的图章！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2月27日。）

致 赵 清 阁

清阁：

贺年片拜领！高山流水般的音乐也不能解除我对于你摔交的惦念！不再度中风当然好，但像我那样骨折也不好受！以后千万小心，必须用拐杖。我现在用的是美国朋友送的助步器，安全但也不轻快。我的文集听说送错了，不该给你平装的，他们走时太匆促，我再补送你一本由邮寄上，万望保重！！

冰 心

十二、廿二、八六、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介绍三篇好小说

看小说是我的享乐，尤其是看好的短篇小说。我认为短篇小说比中篇和长篇小说都难写得好，因为它必须写得简洁、精炼、紧凑。我这人一向护“短”，这问题留给大家辩论吧！

第一篇是邹志安的《支书下台唱大戏》（见《北京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讲的是戏剧团长郑三保，在剧团穷得没办法下，有本县某村为了支书下台、派人来订戏。这村才有五六十户人家，勉强凑起一百一十元来，钱数虽少，郑三保也高兴得一口气答应了。在喜悦和冲动里，他想这个支书一定干了不少坏事，群众才会庆祝他的下台。到了那个村，他才知道原来这台戏是为了安慰这个被撤职的支书而演唱的！吃惊之下，他先访问了乡党委书记老门。老门说：“这戏不能演，支书有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又查不清。郑三保一口咬定没有清问题就把人免了

是不对的，这戏他一定要演。他一面去遍访了村里的男女老幼，最后去看了支书李润娃本人，他发现李润娃的窑洞里挤满了来安慰他同情他的人，这使郑三保觉得这戏一定要演。他要唱“长坂坡”、“八义图”还送一场“卧薪尝胆”。他顶着县文化局和主管文教的县委书记的反对，大声强调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气冲冲地让他的剧团人人卖力地在黑鸦鸦的人海中把戏演完。

这个短篇写得有声有色，结尾也收得很好。

第二篇是李晓的《继续操练》（见《上海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七期）讲的是两个华大中文系毕业生，四眼考上了华大的研究生，黄鱼分配到最为抢手的报社当了四版记者。四眼因为他的导师王教授剽窃了他的论文——“《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怡红夜宴的座次排列”。他来找黄鱼，求他公布这个消息。于是黄鱼回到华大，找到系里第一快嘴的侯老师，把这事说了。这中文系本来就是壁垒森严，连这个派系的助教向对方的女研究生求爱，都被斥为异己，在中文系各宗派的勾心斗角之中，王教授托病躲起来了，黄鱼这里立刻门庭若市，各派系的中文老师都来找黄鱼说话，最后是新当主任的李教授用丰田来接他去。结果呢，四眼的硕士论文的答辩还是没有通过。黄鱼和四眼只好回到他们在大学的那间宿舍里去“继续操

练”。

这个短篇正像《小说选刊》的“编后”所说的“出手不凡”。它幽默、辛辣而又俏皮，似乎看透了一切！招笑处使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后又感到有无限的悲凉。这篇妙语如珠，如黄鱼对四眼说他要揭露王教授剽窃四眼的论文时，他说：

我要起草一篇檄文，让骆宾王的讨武曌比起来像卡西欧电子琴广告。

如四眼送给黄鱼一本“万宝全书”，内有“回肠荡气”和“余音绕梁”等词，说这拿来形容：

男低音，百灵鸟、琵琶、卖冰棍的吆喝、洒水车喇叭，哪怕放屁，这两句都合适。

又如形容华大中文系内部乱成一团：中文系现在就像元春省亲前的贾府，乱得不亦乐乎。刘柳两派之间大打出手，刘派内部互相指责，大有把庐山炸平之势。

在描写四眼硕士论文的答辩失败了之后，他说：

四眼站起，不向任何人看，走出门去。在他面前，人群刷地向两边分开，让出条道来，那景象好似摩西过红海。

他总是嘲笑地称大学里的女生如“小母鸡”，当四眼颓丧地走出考场的时候，黄鱼安慰他说：

别动，你看前面谁来了，这班从没捱过爹娘打骂

的小母鸡，个个心像煤球，根本不理解男人也有哭哭啼啼的时候，咱们可不能在她们认栽。

我不能再抄了，手有点酸，总之这个短篇要读者自己去看，才能充分得到享受。又正如《小说选刊》的“编后”所说的：“像‘继续操练’，近来逐渐多了起来，大概可算是创作中的一种趋势。”

我现在就介绍第三篇，晓剑的《本市市长无房住》（见《中国作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这个短篇也是极其诙谐辛辣地揭露了勾心斗角的“无冕帝王”王国里的争夺，结果姜还是老的辣！

小说中的“我”也是一位记者——市日报社新闻部主任。他才三十六岁，正想望取代五十六岁的总编辑的地位。他利用一个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女助理记者，去采访本市市长何如冰，因为有读者来信，为他抱屈说市长不以权谋私，结果只能住在由工棚改建的小房子里。这报道得到许多赞扬的信，读者们为本市有个好市长而高兴。后来女记者又得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是本市有一座七十年前用大理石盖成的市长楼，只因老市长赖在那里，而不去住新市长为退休干部盖的干休楼；这位新市长也就不去住那分给他的一套四室一厅的新房，而赖在那一个破棚里，“我”就本着这内部情况发了两份“内参”，以此为导火线来炸塌现任总编辑的座椅。“我”认为引起了老

市长对报社不满和愤恨，自然有人出面替他拔掉钉子。内参刊出后果然新市长默不出声，老市长老羞成怒，不久市委宣传部批示下来，将市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免了职。一个月之后，“我”荣任了总编辑，市委下令让老市长住进了干休楼。他一气之下，脑病突发死去了。“我”正舒适地坐在总编辑室里，而前任总编辑却被任为市委宣传部长，原来他是新市长的常客，于是“我”的下一步是要当宣传部长。

这个故事里，还生动地插进了那一位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新来的新闻助理一心想做中国的法拉齐的丁妮妮。描写她每次来谈话时的新衣着、新首饰、新情绪；同时这故事里还贯穿着编辑室屋顶角落的一个大肚子的雌蜘蛛在结网，后来又一只雄蜘蛛也在结网，它们配合之后，雌的就把雄的吃了，来反映生存的残酷。

最好的还是在这篇故事的每一个转折或每一段落之后，总写上一句简短的哲理性断语和总结。如“牛犊的权力”、“历史的误会”、“怜悯的必要”、“不朽的平衡”、“灵魂的哈哈镜”、“神父的忧虑”、“上帝的惊愕”等，都极其冷俏而诙谐。

说起来这三个短篇还要读者自己来细看、来欣赏，你们一定会找出其中更逗笑、更巧妙、更精彩、更引人深思的地方。

1986 年 12 月 27 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7 年 1 月 10 日。)